



新闻研究 资料



西南局《新华日报》创刊前后

建国初期的重庆《大公报》

怀念邵子南、田伯萍同志

四川广播电视发展简况

新闻研究资料

总 第 四 十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责任编辑：阎焕书

封面设计：赵乃义

9219.2-53

25X

436751-
60

220页

新闻研究资料

总编辑 邵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印张 160,000字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04-0164-7/G·3 定价：1.10元

目 录

回 忆 录

- 西南局《新华日报》创刊前后.....雷 勃(1)
- 一次成功的批评报道
- 回忆新华日报批评乱招乱调在校学生的宣传
-甘 泉(6)
- 建国初期的重庆《大公报》.....王文彬(9)
- 解放初期的重庆《新民报》.....陈理源(18)
- 回忆《新华日报》北碚发行站.....左明德(26)
- 在白区新闻战线上(续)
-陈翰伯口述 高崧 胡邦秀整理(35)

深切的怀念

- 怀念老新闻战士邵子南、田伯萍.....甘 泉(46)
- 忆大声周刊编辑人车耀先烈士.....彭文龙(54)
- 《新民报》五烈士.....陈理源(61)
- 回忆王白与先生.....巫怀毅(66)

人物春秋

笔枪舌剑意纵横

- 萧楚女在《新蜀报》.....李畅培(74)
- 成都报人的先驱——傅樵村.....高成祥(82)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记老报人王文彬……………王绿萍(94)

新闻事业史料综述

- 四川广播电视发展简况……………陆 原(102)
解放前成都的新闻界团体……………西 堂(112)
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报界……………左东枢(120)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报纸一览……………曾健戎(132)

报刊史料

-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刊……………沈果正(137)
回忆《川东报》片断……………李丰黎(147)
川西区党委和川西人民的喉舌
——《川西日报》的宣传特点……………李 超(150)
艰苦创业的《川南日报》……………石克绩(157)
川北区党委对《川北日报》的领导……………杨 天(162)
田一平谈《华西晚报》的七个春秋
……………高成祥 雷兴敏(165)
周钦岳与《新蜀报》……………肖鸣鏊(182)
解放前成都的几种工人报刊……………张爱和(189)
民初成都五光十色的政党报纸
……………何承朴(197)
从《工商导报》到《成都日报》……………高成祥(201)
唤民觉醒的洪钟
——万源县《萼山钟》报记略……………李明荣(206)
“五四”后成都的《半月》……………王绿萍(211)

西南局《新华日报》创刊前后

雷 勃

1949年4月，我百万大军胜利渡过长江，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解放华东、华中大片土地，党中央决定由第二野战军从华东前线转向大西南进军。为了解决地方干部不足的问题，中央决定由第三野战军从上海、南京抽调一万名青年学生和干部，组织西南服务团，随二野向西南进军。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我一度在上海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任军代表，搞接管工作。不久，调回《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作。听说要进军西南，我即报了名，经组织批准，6月间派我先到南京进行联系，了解去西南各省区办报人员的情况。我到南京后，找到当时任南京新华日报社社长的石西民同志。他说，他们也准备抽调一些干部去西南，如何分配还不清楚。我返沪后，向夏衍、范长江、恽逸群等同志作了汇报。组织决定抽调40名新闻干部，由我带队，准备去重庆办报。后来又抽调文化教育系统的几十名干部，合计约100人，组成一个去西南的文教队伍。最初，《解放日报》领导指派李辛夫同志带队，但辛夫同志要求改行不作新闻工作，所以改由我负责，担任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解放日报》同来的有马逸峰、范荣康、许川、李峰、吴克之等20多人。《新民报》的陈理源、钱辛波等，也编到我们这个队伍中。大约

是7月底离开上海到南京集中培训。到南京后，华东支前支社的任国昕、刘曦、匡宇中等，还有南京新闻干部训练班的一些同志，也编进我们这个队伍中。在南京我们住在小营。那时，在南京准备去西南的有三支新闻队伍。一批是原在北平《解放》报的袁勃等一批人，准备去云南；一批是从南京《新华日报》抽出的李力众、肖波等，据说准备去川南；我们这批人准备去重庆。当时我提出，我们大都是青年人，参加新闻工作时间短，只能当“配角”。组织上告诉我，去重庆办报，中央还有安排。

大约8月间，北平新华总社也派来几位电讯工作人员，和我们合在一起准备去重庆。他们带来两个铜版报头，一个是《新华日报》，一个是《人民日报（西南版）》，都交由我请示领导决定报名。我们在南京集训了将近两个月，听了很多重要报告，如1949年8月20日邓小平同志的报告，谈南京、上海接管情况，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全党如何团结全国大多数，如何与党外合作问题的重要指示；9月3日，宋任穷同志作关于党对新解放区基本政策的报告；9月20日，邓小平同志又专门向西南服务团作了动员报告，谈了大西南的情况。他对我们这次进军西南，用了八个字来概括：“前途很大，困难很多。”他说：“西南有7000万人口，等于苏联的乌拉尔，西南的地理条件很好，科学家都愿意去，将来是中国的大工业区之一。”针对有些人不愿远去西南，他强调指出：“我们去西南，不是‘充军’，而是党给我们的光荣而重大的任务。”

9月下旬，西南服务团从南京乘火车出发，我们包了两个车厢。从南京经徐州至郑州，转乘平汉路火车南下。在河南中

部有一段铁路受到破坏，正在抢修，我们在车厢里被困了三天，修复后乘车到武汉。这时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我们在汉口也参加了庆祝活动。休息几天后，又乘车南下到长沙。在长沙进行了整编，我们成了西南服务团总团的一个中队，我仍担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我们步行向湘西、四川进军，经益阳到常德。在常德安排进川的准备工作。11月9日，我们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指示。11月11日，又听取了刘伯承同志传达中央关于人民政协会议精神。这两个报告对武装我们干部的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对入川工作进行了组织安排。当时负责川东和重庆地区组织工作的王永福同志找我谈话，告诉我，中央已安排原晋绥日报的人员，还有部分原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去重庆出版报纸，所以准备分配我去宣传部工作。我后来找了西南服务团总团团长曹获秋同志，说明我十年来都做报纸工作，而且还带有几十名新闻工作人员，要求继续做报纸工作，不去宣传部。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且拨给我们三部汽车，随二野三兵团直接向重庆进军。

在将要出发时，原《新华日报》的邵子南、刘瞻、徐君曼、曹岛、羊村等同志也和我们汇集在一起。我们大约是11月18日从常德出发，20日到达湘西泸溪县城。在泸溪与《晋绥日报》的常芝青等同志汇合了。我与常芝青一起会见了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西南局秘书长刘仰峤，研究到重庆出版报纸问题。当时确定仍以《新华日报》为报名，作为西南局的机关报。就由我们这三部分人合在一起（《晋绥日报》、原《新华日报》和上海、南京来的新闻工作人员）办

报。我将原来乘车的非办报人员调整出来，编入步行队伍，把《晋绥日报》来的骨干人员编入车队，分乘三部汽车，作为前梯队，步行人员作为后梯队。我们前梯队11月下旬起，从泸溪经过秀山、酉阳、彭水、南川、綦江，于12月4日晚抵达重庆对岸海棠溪。重庆已于11月30日解放。4日当晚，常芝青同志派我先进城与军管会联系。

12月4日晚，我由吴克之（他曾在重庆育才中学读过书）带路，过江后步行至范庄（军管会所在地），找到张霖之同志。他要我先当军代表，接管《中央日报》和《和平日报》。第二天一早，到对岸将队伍接进城，进驻黄家垭口《中央日报》。我们一面搞接管工作，一面积极准备出报。我向组织提出，我还是筹备出报，请另外同志担任军代表。后来由徐君曼同志（报社经理）负责军代表的工作。

经过几天几夜的紧张筹备，《新华日报》于12月10出版了。重庆人民高兴地说：“《新华日报》又回来了。”这时的新华日报社，由廖井丹兼任社长，常芝青任副社长，由常芝青、李蔚然、雷勃、张惊秋、陈理源五人任编委，李蔚然任编辑部主任，雷勃、张友任编辑部副主任。李蔚然负责白天审稿，张友负责采访，雷勃值夜班，看大样。报纸出刊时，后梯队还没有到，编辑部只有二三十人。人手虽少，工作效率却很高。要闻版由李半黎、陈理源负责，时事版由曾孚、钱辛波负责，副刊由张惊秋、伍陵、邱璜峰（邱韵铎）等负责。当时中央规定，报纸的清样要送西南局书记审查。邓小平同志委托西南局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子意同志审查清样。我每天夜晚都要等候子意同志的电话，常常等到天亮。子意同志非常负责，有时除修改标题外，还改动一些文字。

审查的清样拿回来，最后由我签字付印。子意同志很谦虚，修改的地方都要在电话中征求我们的意见，但对错误却很认真。有一次，一版头条大标题有一个名字错了一个字，他就严肃地提出了批评，我作了书面检讨。

《新华日报》创刊后，成立了党组，由常芝青、李少言、毛伯浩等同志负责。报社成立了党总支，我是第一任党总支书记。不久，高丽生从新华社西南总分社调来任总编辑。后来，钟林调来任总编辑，高丽生任副社长。廖井丹不兼任社长了，由常芝青任社长。1950年10月，我也被西南局宣传部调到重庆《大公报》工作去了。

《新华日报》创刊时是在黄家垭口原《中央日报》旧址，地方狭窄。芝青同志派我到军管会反映，要求找地方搬迁。当时军管会副主任张霖之同志非常支持，给了我一部车子，要我们自己去找，说只要你们认为适合的地方都可以，包括重庆当时最好的大楼“川盐银行”在内。我和毛伯浩、徐君曼等同志到处都去看了。川盐银行房子虽然好，但周围空地少，我们没有要。最后找到了林森路（现名解放西路）原西南长官公署（即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防部的旧址）。这个地方建筑虽然不多，但环境宽敞，南临长江，北靠较场口，从长远看，很有发展前途，可以建新楼房。后来常芝青同志和大家一起来看，都认为这个地方好。我向军管会报告后，军管会同意把这个地方拨给我们。后来，《新华日报》在这里兴建了厂房，盖了办公大楼，直到1954年西南局撤销，《新华日报》终刊，都在这个地方。大区撤销后，这个地方就交给《重庆日报》使用，至今30多年来，《重庆日报》一直在这个地方。

一次成功的批评报道

——回忆《新华日报》批评
乱招乱调在校学生的宣传

甘 泉

1949年11月底，人民解放军神速进军，山城重庆解放，国民党丢下一个烂摊子跑了。人民政权接管以后，百业待举，新的机构纷纷建立，旧职员不能马上启用，部队干部和西南服务团的成员不够用，各党政部门就向大专院校招聘或抽调学业成绩冒尖、政治素质较好的学生。当时学校领导班子尚不健全，抵制不住抽调学生之风。党政机关想要谁就抽调谁，有些班级几乎被抽空了。教师们对此很有意见，却怒而不敢言。他们不了解党，在背后议论说：“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办教育。”有的担心“学校要垮”。当时我在《新华日报》采访文教新闻，向上反映了这一情况，受到西南局的重视。邓小平同志亲自听汇报，作指示，决定要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乱招乱调的混乱现象。

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常芝青同志要我采写新闻，他亲自写社论。在采访过程中，有关单位的领导抱怨说：机构新建，工作要人做，上面派不来干部，不向培养人才的学校抽调人，工作怎么进行呢？我听他们说得有理，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感到这矛盾不好解决。小平同志听了汇报后，便把原拟的社论题目《乱招乱调的混乱现象必须坚决克服》，改成

《是结束学校教育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时候了》，既没有完全否定抽调学生的作法，又提醒大家，再不停止乱招乱调，势必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妨碍建设人才的培养。社论标题的改动，解除了当时一些领导同志的思想顾虑，真是高屋建瓴，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

揭发在学校中乱招乱调的混乱现象的消息和配发的社论《是结束学校教育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时候了》，于1951年6月10日在《新华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广大读者，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教师反映强烈。他们对共产党敢于公开揭露和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非常敬佩。

接着，我又根据调查掌握的大量事实，撰写了题为《立即停止乱招乱调在校学生》的专论，进一步阐明：结束学校教育中的混乱现象，已经刻不容缓，谁要再不注意这个问题，谁就要在准备和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这个重大问题上犯不可容忍的严重政治错误；而停止乱招乱调在校学生，则是结束学校教育中混乱现象的前提。当时有的单位仍未停止错误作法，报上就继续批评，并配发了《再不能容忍乱调在校学生的混乱现象了》的言论。

从6月16日起，报纸上连续发表揭露、批评性新闻报道和社论、专论、短论，引起了各有关机关团体的普遍重视，受到各大专院校师生的热烈拥护，纷纷投书本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但也有少数读者和部分工作人员，仍认识模糊，错误地以为人民政府不重视教育，至少是现阶段不会重视教育。针对群众中存在的这些思想，报纸又及时发表《应以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对待问题》的言论，指出“目

前所存在的混乱现象，是我们新社会发展和进步中所产生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不能对过去的教育工作全盘否定，也不应该以为有了成绩，就高枕无忧，万事大吉，看不见工作中的问题，否认学校教育工作中的混乱现象。最重要的是要正视缺点与错误并加以改正，然后我们才能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继续前进。

在持续20多天的宣传报道中，报纸不断根据工作中、群众中出现的思想问题，有针对性地组织稿件，配发言论，使这一组批评报道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前后共发表新闻、通讯、言论、文章和读者来信等近百篇。最后，于6月24日在报上分别刊出了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结束学校教育工作中混乱现象的指示》，从而结束了这次连续性的批评报道。

这一组连续性的批评报道，给以后进行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和大专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建国初期的重庆《大公报》

王彬彬

重庆《大公报》是1938年由汉口迁到重庆，于同年12月1日发刊的，日出对开纸一张。抗日战争时期，日销最多曾达到97000余份。重庆《大公报》经理是曹谷冰。抗战胜利后，曹调任天津《大公报》经理，由金诚夫继任重庆《大公报》经理。1946年金诚夫调离重庆后，我由《大公报》南京办事处主任调任重庆《大公报》发行人兼经理。重庆《大公报》编辑主任先后调换过三位。先是李侠文，现任香港大公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第二任是金慎夫，约一年光景就辞职回常州原籍搞教育工作了。第三任是顾建平。1949年5月顾建平被国民党反动派捕去，在中美合作所监狱关押了140天，直到1949年9月国民党政府劫收重庆《大公报》以后才释放。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2日我才由北碚回到重庆《大公报》原岗位，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一、业务概况

重庆解放初期，我仍然白天在经理部上班，晚间兼代编辑主任，配合当日重要新闻，连续写过若干篇社评。有一个时期，坚持每天都发表社评。关于财经方面的社评，曾请经济学教授许廷星写过一些。

1950年4月4日，重庆《大公报》正式取得报纸杂志登记证。我写了一篇社评，题为《本报今后努力的方向》，其中说：“本报向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申请登记，已获准发给报纸杂志登记证新字第4号。……本报获准登记，职工同人甚为兴奋，深感今后任务的重大。”“多年来，承各界读者给我们许多支援，使本报继续前进到今天；现在，人民政府又进一步鼓励我们，职工同人除深感兴奋愉快以外，决用全心全力把报纸搞好。在言论与新闻方面，决努力配合国策，完成我们的任务。在业务方面，决向国营公营事业学习，已组成临时管理委员会，积极整编机构，力求精简节约，处处予读者以便利，尽可能达到‘企业化’。在职工学习方面，我们要诚心诚意向群众学习，实事求是，联系实际。”“刘伯承主席讲过：‘此时我们的文化教育，应围绕着恢复与发展生产基本任务来进行的，也就是为人民大众生产而服务的。’本报今后努力的方向，自当主要的遵照这一指示。”

“星期论文”主要由专家学者写稿，如1950年4月份刊出的论文有：萧乾的《我认清了阶级，上岸村斗争会归来》（4月2日）、胡祖源的《当前上海私营金融业的困难及其前途》（4月9日）、崔敬伯的《从特权财政到人民财政》（4月16日）。

办好报纸，不能依赖过去的老招牌，应该随时调查研究读者的需要，才能从实际出发，多为读者的需要着想。城市和农村读者的需要有所不同，但是关心国家大事的发展和市场的物价变化等等，却是大家共同的需要。

重庆《大公报》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当时分配的

任务，着重团结工商界和知识界。因此，经常在要闻版发表经济新闻，如“沪汉物价”、“沪汉蓉物价”、“沪蓉汉穗物价”（均系上海、汉口、成都、广州专电），另有“昨日市场”、“市场动态”、“各地商情”、“经济一周”、“财政金融简讯”等报道，以及“今日船讯”、“川江短航各线票价”等。从1950年4月21日起，又特辟“经济新闻”专栏，集中报道各种经济、财政、金融信息。

为了吸引文教界读者，从1950年4月21日起还特辟“文教版”。其中有“校园园地”专栏，包括许多大学、专科、中学的小新闻，均以各校名称作小标题。这种编法曾引起文化教育界的普遍注意，同时，联系了大量的学生通讯员，学校里如有突发事件发生，他们就打电话向编辑部报告。

重庆《大公报》的副刊、专刊比较多，主要的有：《学习》、《大公园》、《青年群》、《农业生产》、《大众科学》、《医药卫生》、《苏联介绍》、《大公园影剧座》、《新文艺》、《新经济》、《新教育》等。

《大公报》一向重视经营管理工作，为了推广业务，经常在自己的报纸上进行宣传。重庆《大公报》报头下面最显著的地位，经常刊出“大公报广告价目”和推广发行的广告，发行课经常刊发“本报增设代订处启事”，指明读者就近订报的地方，极力方便读者，同时还经常刊出招请分销的广告：“本报招请承办分销（曾列举许多地名），利益优厚，手续简便，如荷承办，无任欢迎。”除和各广告公司建立密切关系，收揽大广告外，还招揽小广告。

解放初期，工商业广告减少，机关团体的广告也不多，只有结婚广告很多，除新婚夫妇和双方家长刊登广告外，还

有亲朋祝贺的广告。如刘昆水和张琍琍结婚志庆启事，就有李紫翔、许廷星、周永林、张群华、赵景生、刘大震、刘丙吉等30人署名的大广告。

由于报纸发行减少，印刷能力富裕，所以对外收揽印件，力求增加收入，也常刊登承印广告：“本报承印：书报、杂志、表册、收据、传单、名片。印刷精美，取费低廉，交件迅速，电话洽办。接洽处：中华路本报承印课，电话41662”。

重庆《大公报》还重视充分利用各种废料，把残破的纸张裁剪装订成册出售。剩余的报纸，也装订成合订本出售。

二、公私合营前后

重庆《大公报》被国民党劫收后，共出版过74天。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所有国民党派到大公报馆的人统统逃跑了。北碚比重庆晚一天解放，那时我在北碚相辉学院，和全院师生员工两千多人分乘小船过江，整队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北碚。

当时北碚传说解放军攻进重庆市中区时，大炮将“抗战纪功碑”（今“解放碑”）打倒了，大公报馆多人受伤。我很不放心，急欲了解实情，便于12月2日搭乘金城银行回重庆的空车赶回重庆。沿途路断人稀，有的地方还有简单路障，我和驾驶员排除路障后始回到重庆市内。

回到市中区才知道，国民党军队匆忙逃走，市中区根本没有激烈战斗过，抗战纪功碑依然完好，大公报职工也没有人受伤。大公报同人见我回来了，都很高兴，劝我留在报馆，不要再去北碚了。我在相辉学院讲授《新闻学概论》《报